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人类发展观“术语的革命”

□ 黄承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面临面临的永恒课题。”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科学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是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生产力增长与生态危机加剧这一发展与保护关系失衡的协调和重构,破解了发展和保护的“二元悖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两个结合”的结晶和典范。探求这一重要理念的形成发展历程和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科学理解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从西方传统发展范式的超越和革新,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植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气派的科学理念;有助于以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形成的“术语的革命”为内核,自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有助于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重构全球可持续发展话语体系、实践体系,推动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孕育、形成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地方经验总结、概念范畴提出、哲学理念升华的发展历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孕育发展。“绿水青山”代表生态财富、环境保护,“金山银山”代表物质财富、经济发展。早在1997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三明常口村调研时就指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在《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一文中指出,“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实则是“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2004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现场会上指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一项“生态工程”,是推动生态省建设的有效载体,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这些都表明,习近平同志早在地方工作期间,就提出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等概念范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智慧。从术语的表达上看,山水意象一直体现了中华先贤对自然的审美和认知,如“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白云黄鹄自来去,绿水青山无古今”等诗句,表达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热爱、敬畏与赞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之中,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凝聚着东方智慧的精神财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正式提出。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安吉余村考察调研,以充满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同志对当时余村关停污染环境的矿山,开始搞生态旅游的做法表示肯定,指出“我们过去搞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深刻阐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战略高度指明了绿色变革的发展路径,强调“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观念不断进步、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的角度,提出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正式提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保护与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思考,对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问题的高瞻远瞩和坚持真理的崇高精神境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丰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理论内涵和实践立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大会报告,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的主要内容。同时,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标志着这一重要理念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and 行动指南,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建设生态文明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其中之一,得到了更为深入的阐发。2021年11月,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将“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同时注重持续深化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内的“术语的革命”,以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为基底,筑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对西方传统发展范式的超越革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2年我在福建担

任省长时就提出福建要建成中国第一个生态省。到浙江工作后,2005年我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这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根本就在于这一重要理念以“两个结合”的鲜明特质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生态文化基因之中,与时俱进地彰显出时代价值。同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和保护辩证统一的基本内涵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范式的历史性超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自然优先于人类、人来源于自然、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指出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类的自然界,人通过“劳动”的中介同自然构成相互作用的整体。毫无疑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彰显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存在无法弥补的裂缝,批判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可调和性以及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思想家的非凡智慧,既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与自然关系紧张”,又提出了“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等科学论断,这在人类生产力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生产力理论在21世纪的创造性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主流及其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道法自然”等理念,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宇宙观、自然观以及处理天地、天人关系的独特方法。可以说,中华文明向来强调和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将天地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传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不否定人类合理利用自然的权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架起了桥梁,实现了“道”与“器”的统一,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显示出与时俱进的创造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范式的超越。人类文明发展史,本质上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史。西方生活哲学体系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之上。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的严格区分,弗朗西斯·培根主张科学知识应服务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等,使人类中心主义、理

性至上和机械自然观成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础。近现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将生态环境视为生产力的外部条件而非内在要素。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索洛增长模型,都未将自然资源纳入生产函数的核心考量,这种理论缺陷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公地悲剧”的蔓延。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试图通过“外部性理论”修正市场失灵,但始终未能真正解决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超越机械论的客体化思维,赋予自然主体性价值,在价值重构上强调自然价值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生态优先基础上的生态价值转化理论;在增长理念和方式上,矫正西方增长理论的“生态盲视”,注重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性,形成了基于生态内生动力 的增长论;摒弃“市场万能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体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系统性变革,开创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关系表达的全新范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表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到农业文明的“有限改造”、工业文明的“征服自然”,再到生态文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认知经历了螺旋式上升过程。在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阶段。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因对煤炭等资源的大量需求导致了持续百余年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同一时期,日本发生了被称为“水俣病事件”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在我国,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盲目发展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些教训都警示我们,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一旦遭到破坏,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根本上实现了从“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转变,强调始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西方经济

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会随人均收入的增加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后又会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形成倒U形曲线。从实践上看,这种理论具有误导性,似乎只要等到拐点,环境自然就会改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了发展和保护割裂的错误认知,从本体论层面突破了传统发展观念中生态与经济“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这一重要理念所蕴含的自然价值观将生态环境从“发展成本”转化为“发展资本”,实现了自然系统价值论的重大突破;绿色生产力观将生态因素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内部动力,把生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社会再生产体系,是人类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在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中确立“生态优先”的价值抉择,重新排序了发展优先级,构成全新的发展逻辑学。

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西方现代化之路充满破坏性、掠夺性和转嫁性,背后隐藏着残酷的剥削和全球范围的结构 性不平等。西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是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产物,通过掠夺自然和转嫁成本实现自身现代化,导致全球生态危机与发展失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长期陷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元对立的困境,无论是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悲观预言,还是传统发展模式“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都未能跳出静态模型的机械性局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对立,而且通过公平分配生态红利,构建全球生态治理新秩序,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发展与保护协同、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新选项,是对工业文明弊端的系统性摒弃。这一理念的实践,不仅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文明形态的升级,将引领人类走向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引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生物物种减少等问题仍然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传统西方生态治理范式的局限性更加凸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生态价值内生 化、增长范式协同化、治理模式系统化,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哲学,新发展经济学,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念遵循和可行路径。新时代中国通过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倡议主张,深刻影响了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绿色转型引领者与负责任大国的制度自信和国际担当。我们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术语革命”为内核,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全面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建构和引领全球绿色生态话语体系,科学回答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原载5月14日《人民日报》)

构建以人才资源牵引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新型模式——浙江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要求承担着重历史使命的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于2024年创新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系统性遴选首批1570余名优秀文化人才派驻乡镇(街道),结对村(社区)开展文化建设帮扶,全面嵌入基层文化场域,建立起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顺畅通道。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扎实举措。

文化特派员制度注重“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有机结合,强调“整合性”视角,实现对多方资源的综合高效协同应用,率先破解城乡区域优质文化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难题,通过外部资源引入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式发展,以精准文化赋权的模式构建基层文化服务供需结构,在主流价值柔性浸润中激活乡村文化生产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厚植文化力量。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文化特派员作为打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最后一公里”的新型力量,始终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基层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联结、征召动员等环节,将多元化、碎片化的优质文化资源集聚整合,创新打通向基层投送的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坚持“外引内育”,以外部优质文化资源激发乡村内部文化活力。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农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亟须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供给和服务。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式发展侧重本地村民群众能力建设与参与、通过内部成员与外部力量的互动循环,建构内外互促、共生发展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文化特派员制度以外部优质文化资源的输入为契机,通过选拔宣传思想文化机关干部、媒体记者、文艺院团职员、高校教师、城乡规划师等在文化领域工作多年、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文化人才担任文化特派员,以活动开展、平台搭建、培训指导等方式有效激活派驻地的文化资源以及乡村文化建 设主体的能动性,努力建构优良乡村文化生态,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文化人才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发展“文化经济”,以优质文化产业赋能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能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与经济协同共进,能够实现文化存量向经济增量、文化资源向经济动能的转化。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文化经济”,旨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社会发展联动。文化特派员通过挖掘整合文化资源、系统培养文化人才、提升优化文化环境,大力发展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乡村文化产业,为促进经济融入人文、人文浸润经济,实现二者共生共荣贡献力量,推动乡村从文化资源持有者转变为文化生产力发展主体,助推乡村干部群众在物质和精神上共同奔“富”。截至目前,文化特派员通过文旅规划、文创产品销售等方式帮助驻地增收1.9亿元。同时,文化特派员积极参与弘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文化赋能乡村自治、法治、德治,通过互助合作、集体仪式等文化治理形式,提高村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助力“共享共富”,以资源合理配置缩小区域文化发展差距。2023年9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明确要求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强调“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解决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浙江结合“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根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分类定级,将其量身定制、按需分配文化特派员资源;另一方面,引导优质文化资源更多向山区海岛等偏远地区倾斜,在项目扶持、资金投入、人才支撑等方面加大力度,通过外部力量参与本地发展,帮助缩小区域文化发展差距,有力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群众家门口。

以制度改革增活力,重塑文化供需适配生态

当前,基层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差异化、多样化的特点,要实现文化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必须以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嵌入促进规范执行,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式发展,推动各方资源实现有效整合。着眼建立健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制度,浙江构建涵盖人员选派、职责界定、服务管控及评价激励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坚持以系统观念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效能,将文化特派员工作从经验化探索转向标准

化治理,为破解基层文化服务困境提供制度样本。

明确“权责清单”,标准化搭建“特”“派”体系。为避免选派过程的主观性与粗放化倾向,浙江在相关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规范“选什么人”“派下去做什么”“如何管理保障”等具体细则,回答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基础性问题,“特”要求文化特派员聚焦宣传文化主业,在所驻乡镇(街道)、村(社区)范围,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承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基层文化活动、扶持文化产业等职责任务,全面覆盖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派”指文化特派员在两年服务周期的派驻过程中,既不错离原工作岗位,又要实现每年驻点服务100天左右,且每个月至少赴基层指导服务1次,以弹性化配置方式有效满足专业资源下沉与行政成本控制的双重诉求。

着力“长效驱动”,一体化统筹管理服务。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具有长期性、连续性,需要在管理与服务耦合而成的机制规范下保留相应的自主供给空间,并加强对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浙江出台《文化特派员工作实施意见》,编制《文化特派员工作参考指南》,打造包含“服务端”“项目库”“专家库”的数字化工 作平台,以“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文化服务机制,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同时,文化特派员工作搭建了“省统筹、市指导、县(市、区)负责、乡镇(街道)抓落实”的网格化、分级制服务管理矩阵,建立“中期评估、届满评价”全过程考评机制,推动项目闭环落地。此外,创新性建立浙江省文化特派员之家作为实践交流载体,并组建三级文化特派员工作组,以常态化开展的例会制度促进资源共享、创意联动、项目协作,打造“理论研讨、经验分享、实践反馈”的科学化、规范化工作运行体系。

以项目落地为支撑,筑牢乡村文化事业基石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比较之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实一点,精神文明建设虚一点”,强调“干工作必须虚实结合,尤其是虚功一定要做实”。抓好文化项目就是虚功做实的重要体现。文化特派员制度着眼以更大力度实现文化惠民,将虚功做实的要求贯穿始终,以“项目制”打通资源下乡的通道,将外部资源转化为适合本地需求的公共文化品供给,并以项目化管理的形式强化多方协作,有效破解基层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需求响应滞后等深层结构性矛盾,为补齐基层文化领域短板提供了兼具制度刚性与实践弹性的创新解决方案。

聚焦“急难愁盼”,及时回应群众实际诉求。基层文化建设的千头万绪,抓住重点和难点,就能够有效回应群众诉求、保障公民文化权益,实现“有的放矢”。乡村文化发展应特别关注当地群众的需求,通过各种方式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享有决策权、控制权和收益权。每一位特派员在做好基本文化服务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分层分类了解群众文化需求和基层建议,并和派出单位、派驻村(社区)联动谋划推出重点文化项目。文化特派员通过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化载体,积极回应乡村对高品质多层次文化化的旺盛需求、对推进文旅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挖掘提炼弘扬地域优秀文化的更高期待,持续稳定地为乡村提供文化服务与建设支持。

彰显“因地制宜”,推进特色文化项目建设。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村文化振兴也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展现“千村千面”的特色风采。浙江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推动开展的各类文化项目建设,涵盖保护文化遗产、指导乡风文明建设、丰富文化服务、打造文化品牌、做强文化产业等不同类 目,深入挖掘乡村资源禀赋,盘活乡村各种发展资源,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文化建设的 地方特色和创新性导向。例如,龙泉市溪头村“文化激活溪头村文旅产业融合”项目、安吉县“大余村大研学”项目、宁波市鄞州区“羽人竞渡”龙舟文化品牌项目等,既保留了乡土文化的个性与灵魂,又展现了新时代的价值观、审美观。文化特派员制度以文化项目为抓手,以项目成效论英雄,真正做到了派什么人、带资金、送项目、惠百姓,努力打造基层有感、群众受益的民心工程。

以全域协同聚合力,打造文化人才共建高地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也是乡村内部力量整合的过程。文化特派员制度遵循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的原则,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助推地方力量整合和发展,既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又注重有效整合分散的人才资源,以叠加效应识别价值共创主体,推动乡村文化队伍建设在资源均衡和资源驱动创新的情境下迈向“集团作战”。

注重“送种结合”,培育内生性乡村文化生态。乡村文化振兴,“送文化”是外在帮扶,“种文化”是内在驱动。文化特派员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秉持“服务一个村,提升一个镇、带动培养一支队伍”的工作思路,将满足文化需求与释放文化创造力相结合,以“送”为主,寓“种”于“送”,“送”“种”结合,推动文化供给模式由单向“投送”向主动参与转变。该制度借助对村民、返乡青年及新创客的文化素养与知识体系的培育,以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联结分散的村民,以组织吸纳、模范带动等方式积极挖掘和培养基层文化人才,倡导全体村民共同参与 到精神文化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使其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建立精神共同体,在更深层次上发挥文化联结作用,成为乡村文化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主体力量,进而培育共建共享的文化生态。

注重“以点带面”,引导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群策群力。文化特派员既是基层特色文化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联络员。各地文化特派员充分调动和发挥乡镇(街道)宣传委员、文化站站长、科技特派员、农村指导员、乡村本地专业文化人才乃至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主体力量,集聚乡村社会资本,促进优势互补、群策群力,深度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协同推进基层文化建设。文化特派员与科技特派员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角度对村民进行产业引导、培训带动与创新扶持,大力拓展农文旅等项目,有效促进了乡村文化发展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目前,浙江已累计组建近4000支文化队伍,进一步筑牢了乡村文化繁荣兴盛的根基。

注重“聚才引智”,助推乡村要素跨域流动。促进乡村文化建 设内生式发展,需要形成多元力量交互作用、动态协调的新格局。文化特派员队伍并非孤立个体的行动机制,而是依托派出单位构建起的一个有机联动的行动者网络。一方面,在文化特派员选派方式上注重双向性,即依据文化特派员的专长、意向等与派驻村先行双向选择,再进行组织调配,做到人村匹配、精准对接。另一方面,省直机关、省级宣传思想文化单位、高校等派出单位,以外部赋能参与乡村文化发展相关项目,通过文化特派员将各自文化产品、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传播渠道等优质文化资源系统性嵌入基层,进一步实现了文化服务的“精准定制”,助推基层文化资源高效配置,促进乡村内部组织能力的提升。作为具有特殊资源整合力和文创策划力的文化特派员,在合作共进中汇聚起乡村文化建 设新力量,为把高品质文化资源送到基层“最后一公里”,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撑。

(原载5月13日《人民日报》)